

# 第一章 北京地区帝王、名人陵墓的概况及考古发掘成果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同其他历史古都相比，北京的历史有两大特点：一是从远古至今绵延不断，一脉相承；二是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点。北京历史，经历了一个悠久漫长的过程。如果从它初次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时开始算起，已经有 750 多年的历史了；从城市发展史上看，应该有 3000 多岁的高寿了；而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计算的话，则应该起码有 70 万年的演进历程。它的演变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同步。从远古开始，这里便留下了线索连贯、脉络清晰、内容系统而又比较完整的史迹。北京地处中原与华北、东北各族人民生活的交结地带。自古以来，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民族矛盾的时缓时剧，民族融合逐步凝聚，是北京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北京像是一座民族荟萃的熔炉，集中各族人民的优良传统、劳动创造和聪明才智于一体，而成为我们多民族伟大祖国统一、团结、繁荣、昌盛的缩

影。

作为悠久的历史与文化长期综合积淀的结果，北京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古都风貌，从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因地下文物埋藏丰富、地上帝王、名人陵墓众多而闻名于世，极具特色。这些文物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载体，凝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也为游览景点的开辟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很多神秘的历史烟云就藏匿于其中。透过对逝者世界的观察，我们能够看到逝者生前的生活风貌，而不同历史时期墓葬葬制的变化也就反映了人类社会由远古到近代的变迁。尤其在“敬祖畏祖”的传统中国社会里，这些被称为“地下星空”的陵墓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当然，帮助人们发现这些潜在价值的考古工作者们功不可没。

## 第一节 北京地区帝王、名人陵墓概述

从远古开始，我们的祖先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崇拜以及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人死之后灵魂还在，地下地上代表了阴阳两界。因此，我们的祖先借助墓葬表达了自己对死后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寄托。

伴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逐步发展，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权利的控制，建立了一整套的祭祀制度和埋葬制度，并随着朝代的变迁逐步加以发展，墓葬葬制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墓葬葬制的不同成了区分不同阶级的重要标识。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掘为这一发展过程留下了生动而详实的记录。

作为一个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北京被不同时期的一些统治者所重视，被其视为风水宝地。多少朝代以来，一代又一

代的王侯将相曾在此居住，并选择这里作为死后安息之所。最早的一个当是三千年前周初召公的后代燕王，其间经历了战国、两汉、辽，各代王都在这里修建了王墓，发展到金、明、清时（元朝皇帝葬在外蒙古的起辇谷），由于北京政治地位的提升，北京地区出现了级别高于王墓的大型陵墓群：明十三陵和清东陵和西陵。<sup>①</sup>

在宗法观念浓厚的中国古代社会，帝王将相梦想长生不老却难遂人愿，于是费尽心机将自己的陵寝修得或壮观或雅致，豪奢浮华，当其死后入葬时，还将心爱珍奇异物随葬。历代王朝都将祭陵视为每年的大典，祭文执笔人每每用尽才思，将祭文写成最无可挑剔的漂亮文章。因此，虽然今天的后人鄙薄统治阶级追求死后生活奢华的荒诞行为，但却无法否认：祖国境内的帝王名人陵墓中所蕴涵的巨大文化、艺术、历史价值远远超过墓葬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自身价值所在，因而不断地吸引着海内外游人纷至沓来拜谒、参观。

根据已发掘的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所提供的文化遗存来看，在西周初年还处于奴隶制时期的燕国，厚葬制度就已盛行。燕国贵族墓均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贵重物品，如一些极为珍贵的青铜礼器、漆器等，而且附带大型车马坑，陪葬有马车数辆，并殉有数个奴隶（人殉）及殉牲。一般来说，陪葬品的数目越多则显示墓主人的地位越高。在这些贵族墓葬中，1193号墓由于规模巨大（五车十二马，并带四条墓道）和刻在青铜器具上的特殊铭文被认为是燕国某代侯王之墓。另外，人们还发现一座规模更大的墓葬（殉葬二十四匹马），由于一些技术操作上的原因，此墓尚未被进一步发掘，不过很多学者认为它有可能就是

虽然清东陵、西陵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但在清朝时，因为两地同为京师所辖制，所以清东陵、西陵应当列入北京地区帝王王陵墓葬中。

燕侯之墓。

从春秋末期开始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墓上坟头封土的葬俗盛行。从一开始，就按照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把坟头的大小纳入了封建礼制的范围。这种外形现在还很常见。不过，伴随着封土形式墓葬的出现，人殉的现象倒是大大地减少了，封建主义文明逐渐取代了奴隶制文明。坟头封土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方上”形式，即在墓坑（地宫）之上用黄土夯筑成一个上小下大的梯形锥体。因为其上部为方形平顶，所以得名。秦、汉两代帝王陵墓多采取这种形式，北京地区还未见有。

第二阶段是以山为陵，用山的峰顶作为陵墓的坟头，其目的是为了节省工时和以防盗墓。此种形式的陵墓葬制开始于汉代，唐代日渐流行。在北京，第一座皇家陵墓群金代皇陵也是依山而建的。当年，金海陵王选择了北京西南房山的云峰山脚下这块宝地，后来这里先后建起的十七座帝陵气势宏大，布局严整，显示了非凡的王家气派，尤其是金章宗完颜景的道陵曾被誉为燕京八景之一的“道陵苍茫”。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几百年来几经破坏和盗掘，今天的人们已经看不到金陵的原貌了。在一片废墟中，昔日雄伟壮观的金陵遮着神秘的面纱，已不见往日的庄严气派。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考古学家将这面纱揭开了。

坟头封土的形式第三个阶段为宝城宝顶阶段。由于山、土耐不住风雨侵蚀，为了永固起见，明清两代创立了宝城宝顶的形式。就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砖城内填土，填的土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圆丘，城墙砌筑垛口和女墙，恰似一座小城，称“宝城”，这个圆丘就称为“宝顶”。另外，宝城前都有享殿（原是给死去的皇帝安息之用，后来用做祭祀之礼），碑楼，神道，石象生等。整个陵墓建筑，规模宏大。明朝十三陵和清东、西陵都属于这一种陵墓建筑形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两朝帝王

们对权力和礼俗极尽张扬的一种体现。

明代帝王陵寝制度对汉唐两宋时期进行了重大改革，走向比较成熟的阶段：陵墓形制由方形改为有利排水和保持干燥的圆形；更注重棺槨的密封和防腐处理；取消了陵园中供帝王“灵魂”起居的下宫建筑，扩展了供拜谒祭奠用的上宫建筑，并于英宗朱祁镇时期最终取消了陵寝中留居宫女殉葬的制度，淡化了过去的迷信色彩，与此同时，朝拜祭祀的仪式却更为隆重；受南方园林建筑形式的影响，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总的来说，明朝的帝王陵墓葬制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厚葬、隆祭、久祀，这是明朝专制皇权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缩影。明朝的十六位皇帝中，除太祖朱元璋葬在南京孝陵，建文帝朱允炆兵败失踪，景泰帝朱祁钰被贬葬于金山外，另外十三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十三陵中，其中，成祖朱棣的长陵规模最大，万历的定陵和嘉靖的永陵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最简陋的是末代皇帝崇祯的思陵。十三陵是目前为止我国保持得最好的帝王陵墓群。目前，只有定陵已经发掘，并向世人开放。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其统治中心在关外，即今辽宁省境内。这样，历史上就留下了今辽宁境内的清初关外四陵。<sup>①</sup>

入关之后的清初统治者，开始秉承明朝统治者的陵墓建制。为了加强清朝统治的需要，入关之后的清朝第一帝——顺治皇帝把陵址选定在京城东部河北遵化的马兰峪，即清东陵之孝陵。此后，其子康熙大帝也跟随父皇，把陵址选在清东陵区孝陵以东的偏角处，即清东陵之景陵。当然，如果假设清朝历史上接替康熙的雍正皇帝依然把陵址定在东陵，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位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了。因为雍正皇帝的不循规建陵，开辟了清朝历史上另一片大型的皇家陵园——清西陵。

参见：第八章清朝帝陵之第一节，清初关外四陵。

此后，乾隆皇帝为了既不冷落两处祖陵，又使大清朝王室的皇家葬制有章可循，规定以“兆葬之制”代替“昭穆之制”<sup>①</sup>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样，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除了末代皇帝溥仪因清朝的灭亡，其帝陵停止修建外，<sup>②</sup>其他的九位皇帝中，乾隆皇帝遵照“兆葬之制”跟随顺治、康熙葬入东陵，开辟清帝死后分葬东、西陵之先例。其以后的清朝帝王循序而葬，分别葬入东陵和西陵。不过，“兆葬之制”曾两次被打破：一是道光皇帝时，因其建在东陵宝华峪的地宫浸水，改葬清西陵之慕陵。二是同治皇帝时，年少而丧，当时掌握朝政实权的慈禧太后依个人的好恶，把本应葬西陵的同治皇帝葬入清东陵之惠陵。

北京地区除了具有建筑壮观、布局规整的帝王陵墓群外，还有着成百上千座古代名人的墓葬。这里主要撷取其中比较有影响、并具有代表性的封建王朝中几位名人的墓葬。例如，本为契丹族、却先后为金朝和元朝统治者所重用的一代名臣耶律楚材墓，几个朝代中人们对他的不同看法，从人们对待他墓葬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确为世事沧桑的见证；与马可波罗齐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时的中国土地获得了极其珍贵的一块墓地。他的墓葬，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色，似乎在默默地讲述着墓的主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的杰出贡献；一代名将袁崇焕的墓碑记载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千古奇冤，似乎在向后人昭示着什么；清朝时经历了四朝皇帝的大总管李莲英倒是比以上几位人物都风

参见：清东陵之裕陵篇。

② 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末代皇帝溥仪于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被迫颁布《退位诏书》，宣布退位。其后，他曾于民国六年（公元 1917 年）和民国二十三年（公元 1934 年），分别在反动势力的拥护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用下，两次复辟。末代皇帝溥仪在解放后，于 1950 年 8 月，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监禁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 年 12 月 4 日，经大赦而获得自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于 1967 年 10 月 17 日因病去世，曾任全国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尸体经火化后，骨灰被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光，他的藏着各种宝贝的“鸡蛋坟”居然也修成了帝王陵墓建制特有的宝城宝顶的形式……

## 第二节 北京地区 50 年来考古发掘新成果

建国五十年来，由于党和国家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工作的高度重视，加大了对科学考古事业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考古工作者们凭借现代化的先进的科学考古手段，辛勤勘探、挖掘、清理和甄别，使一些旧的文化遗存相继有了新发现，并得出了新结论；同时，在考古工作者们的艰苦努力之下，一大批新的墓葬和王陵也陆续重见天日，并向世人开放，全面展示了其原有的风貌。建国五十年来，考古发掘工作，极大的丰富了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凭证。

1949 年以后，贾兰坡等人主持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出 5 颗北京人牙齿、一个下颌骨、一个头盖骨，使人们对于北京猿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于 1972 年建成了北京猿人展览馆。

1956 年至 1957 年，在郭沫若、吴晗、夏鼐等人主持下，中国社科院考古队成功发掘了明代帝王陵寝——十三陵中的定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并建立了定陵博物馆，向人们开放，为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也使北京又多了一个著名的人文旅游景点。

1957 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南发现了辽金宫城的夯土台基。

1973 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距今四、五万年前的新洞人遗址。

从二十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琉璃

河发现了包括有古城墙、居住区和墓葬区的占地广阔、内涵丰富的商周古城遗址。在对这一遗址的发掘、研究和揭示中，人们终于发现了北京建城的秘密：当年周初燕国的始封地确在此处，同时还确定了北京建城的确切年代：公元前 1045 年。

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丰台区大堡台发掘出了具有典型“黄肠题凑”葬制的西汉王墓，填补了考古学上的一大空白，并建立了大堡台西汉墓博物馆。

1978 年，在对元代妙应寺白塔进行整修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塔身内藏有的大量珍贵佛经、戒珠、舍利子、织锦、珠宝以及乾隆皇帝的手书等。

1984 年，在北京平谷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可作为北京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杰出代表的上宅、北埝头文化遗址，并在美丽的金海湖畔建立了上宅文化博物馆。

1985 至 1987 年，北京市文物局工作队在北京市延庆军都山一带发掘出葫芦沟、西梁堖、玉皇庙等十几处独特的古山戎墓葬，墓葬遗存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以及带铜扣的覆面巾为代表，这为揭开这个已经消逝民族留给我们的神秘之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并建有山戎墓葬博物馆。

1986 年，考古学家在北京昌平白浮村发现了三具木椁墓，这是继琉璃河商周遗址之后发现的另一处重要的北京地区西周墓葬，对研究西周时期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尤为突出的是，这里出土了国内非常鲜见的西周时期带字卜甲。墓葬中的文化遗存显示了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合。

1986 年至 1989 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云峰山对破坏严重的金陵中的睿陵和道陵进行了试掘，初步探明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章宗完颜景的陵墓规模。

1990 年，在大观园一带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金中都水关遗址，为研究金代北京地区的河流走向、建筑特点和社会生活找到了重

要的实证，并在现场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

1996 年，在北京王府井发现了距今 2 万年前的王府井人，这一发现证实了该历史时期北京人的生活已经开始不仅仅局限于山区，而是向平原发展；人们不再仅仅被束缚在漆黑的洞穴中，而且开始探索树下洞外平原之上的广阔空间。

2000 年夏。考古专家在北京延庆地区的一个居民住宅工程中，发现了一处拥有 72 座古代墓葬的大型古代墓葬群。专家认为，这是北京地区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古代墓葬群落。这些古代墓葬，包括战国、汉、唐、辽、金等多个朝代的古墓。其中以汉唐墓为主的砖室墓有 25 座，以汉墓为主的土坑墓有 47 座。此外，在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 3 件唐三彩及其他陶器、铁器、铜镜等重要文物 1000 多件。其大量出土文物及墓葬形制不仅与中原地区相异，而且与北京其他地区出土的同时期遗存也不尽相同。这说明古代的延庆地区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相互融合的关键地区。考古专家还根据此处墓葬群的规模推断，现在的延庆县附近在汉唐时期很可能存在一个大规模的城市。

应该说，2000 年是北京地区考古历史上收获颇丰的一年。正是由于公安干警对石景山区一起盗墓案的侦破工作，引发了北京地区建国后继定陵发掘、丰台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工作之后又一起重大考古发掘工程的开始——老山汉墓考古。从 2000 年 2 月 24 日老山汉墓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一直到同年的 9 月，这项工程一直牵动着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普通市民的心。可以说，一项纯学术性的考古发掘工程成为了一次面向普通民众的考古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中央电视台还于同年 8 月 20 日进行考古发掘的现场直播。而且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中科院遥感所的科研人员进行的红外遥感探测，在老山地区可能还存在着大规模的汉墓群。

因此，可以说，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丰富而多样，贯穿了从远古到近代的文化遗存层面。当

然，考古工作同其他科学一样，也是永无止境的；同时，作为研究、考察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它还担负着进行社会教育和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责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的日益发展，我们期待着这项事业为北京揭示出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给予这个城市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在，让我们进入这些神秘的世界，去仔细地品读历史吧。

## 第二章 远古的回声

### 第一节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 一、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史

很早以来，北京地区就有了人类生活和劳作的印记。闻名世界的“北京人”，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类。根据考古学家对已经发现的有人类遗迹地层的科学测定，“北京人”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70 至 20 万年的洪荒时代，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sup>①</sup>

“北京人”遗址位于今北京城的西南，距城大约 50 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当地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龙骨山”。关于这座山名称的来历，还要讲一讲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居民世代所从事的职业。据历史记载，早在宋朝时，当地人就在此开山凿石，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龙骨山”一带盛产石灰的历史悠久，工匠们在开山凿石的过程中，经常在石灰岩洞穴和裂隙内

靠打制的方法制作的石器，器形简单，作工粗糙。考古学上把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它是人类诞生后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发现一些难以辨认的动物化石，因为人们搞不清其究竟为何种动物的化石，所以统称之为“龙骨”，卖给中药店作为药材，据说可以主治癫痫、惊悸、久泻、盗汗等病症。于是，这座海拔一百多米的小山就被人们叫作“龙骨山”。

但是，真正认定所谓的“龙骨”实际上是古代动物的骨骼化石，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德国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基尔，在对流入本国的大量“龙骨”进行研究时，发现其中的一件与人类的牙齿化石极为相似。这一发现，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水中荡起阵阵涟漪，引起了学术界对所谓“龙骨”的重视。

1918 年，时任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到周口店地区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这里埋藏着古生物化石。1921 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丹斯基来华，与安特生合作，开始了对周口店龙骨山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发现了一处化石堆积丰富的地点。这就是后来发现北京人的所在地——“周口店第一地点”。

从 1921 年至 1923 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犀牛、野猪、鹿、水牛、剑齿虎等。经过认真研究发现，在这些化石资料中包括两颗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这一发现在中外学术界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此，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院签订协议，决定于 1927 年开始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工作。

从 1927 年至 1928 年的两年中，在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硕。其间，出土了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的上、下颌骨以及牙齿化石。<sup>①</sup> 在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过程中，1929 年 12

当时的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牙齿进行研究，提议在人类学的分类中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学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主张俗称“北京人”。从此，这个名称沿用至今。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今天“北京人”的学名已经改为“北京直立人”。

月 2 日是人们最应该记住的一天。这一天，在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出土了第一具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那是 1929 年冬日的一个午后。当天下午 4 点多钟，在龙骨山深达 12 米的山洞内已经是漆黑一片。冬日的严寒也无法阻挡考古工作者的热情，人们点燃了蜡烛，在昏黄摇曳的烛光映照下继续工作。突然，有人叫喊：“这是什么？是人头！”并不大的声音划破冬日的静寂，使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寻声纷纷围拢过来，所有人心盼已久的东西终于出现在人们眼前。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心情都异常激动。是马上挖掘出土，还是明日天亮再挖？这一问题引起一阵争论，最后人们决定连夜挖掘。就这样，轰动世界的完整猿人头盖骨出土了。它沉睡了几十万年，终于又重见天日了。周口店也因为这一发现而名闻世界。

从 1927 年开始，对周口店遗址的正式发掘工作历时十年。考古人员共发掘出了人骨化石、动物化石、石器等 10 万多件，足足装满了一百多个箱子，成果丰硕。但是，随着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炮火使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

1949 年北京解放后，在贾兰坡等人的主持下重新恢复了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取得重要的收获。其中包括北京人牙齿 5 颗，下颌骨一个以及一个残破的头盖骨。

## 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成果及重要意义

“北京人遗址”是当今世界极为罕见、埋藏极其丰富的原始人类居住的山洞之一，是世界人类学研究史的一座价值连城的宝库。

迄今为止，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已经发掘出来的人类骨骼化石有：完整和较完整的头盖骨 6 件；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2 件；下颌骨 15 件；牙齿 157 颗；股骨断片 7 件；胫骨 1 件；肱骨 3 件；锁骨 1 件；月骨 1 件。这些骨骼代表了四十几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时间的人类个体。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和其他几个地点，还发现北京人制造和使用的近 10 万件的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遗址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根据在此发现的大量化石、石器和兽骨等遗物，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对“北京人”的体质形态、文化遗存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大量的事实说明，“北京人”生活在距今 70 万至 20 万年之间，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过程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其体质和外形已经具备了人的特点，但是仍保留着类人猿的特征。

“北京人”头骨低矮，额骨低平，并明显向后倾斜。眉脊宽大并向前突出。颅骨壁很厚，平均厚度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鼻骨很宽，并且鼻梁扁平，上颌骨明显向前突出，下颌骨前部明显向下方倾斜。“北京人”的牙齿比现代人的牙齿大而粗壮。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了“北京人”的原始性。但是，“北京人”的肢骨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特征，其上衣已经和现代人的没有太大区别；虽然下肢还有点屈膝，但也和现代人的比较相似，快速跑动已经不成问题。根据考古测定，“北京人”的脑容量为 1088 毫升（约为现代人的 80%）。据此推算，男性身高约为 156 厘米，女性身高约为 144 厘米，总之，“北京人”的身材比现代人略矮一些，

这表明人类进化过程中身高也是逐渐加大的。<sup>①</sup>从“北京人”体质特征来看，他们身体的各部分发展不平衡，肢骨比头骨进步。因此，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肢骨的转变应该是先于头部的。

在周口店遗址发现的近 10 万件遗物中，包括打制成的石锤、石钻以及各种砍斫器、尖状器、刮削器以及雕刻器等，这些石器的原料主要采集于附近的河滩和山坡上。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它标志着“北京人”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遗留下来的器具还说明，当时“北京人”所使用的石器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工。现今仍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北京人”是否使用过骨角器。但根据最近几年的观察研究，在已经发现的大量破碎骨片中，确实有一些带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迹。

此外，在“北京人”生活的洞穴中，人们还发现了不止一处的用火遗迹：具有相当厚度的灰烬层、烧骨、烧石、鼠、蝙蝠等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木炭以及烧过的朴树籽等。因此可以说，“北京人”不仅已经能使用火，而且能控制火。正是依靠火的光明和热量，他们具有了照明、取暖、熟食和抵御猛兽侵袭的能力，增强了自身同恶劣的大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恩格斯对此评价时说：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sup>②</sup>

在“北京人”生存的长达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里，山川大势和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对于当时的气候条件，学者们之中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大体上都认可一点：“北京人”生活

吴汝康、董兴仁：《北京猿人化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版。

在“不冷不热”的温带气候中。即便如此，生活在几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的抵抗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学者们研究了三十八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发现其中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仅有一人；与此同时，十四岁以下的却有十五人。“北京人”的短寿可以归因于猛兽的侵袭，饥饿以及寒冷的威胁。

正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集体劳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因此，“北京人”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在他们居住过的山洞里，残留下兽骨、鸵鸟蛋化石和豆科植物种子等说明他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

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同自然界作着顽强的斗争，揭开了北京历史精彩的序幕。通过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它在全世界已经发现的同阶段人类遗址中文物遗存最丰富、最系统，它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周口店猿人洞遗址和“北京人”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完整而确实的地质资料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已经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以北首次发现。因此，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猜测了。”<sup>①</sup>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北京人”化石，除了 1949 年以后发现的 5 颗牙齿、1 段上臂骨和 1 段腿骨尚存之外，其余的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山顶洞人”化石一起全部被外国人盗走，至今仍下落不明。但是，人们期待着“北京人”化石重新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 第二节 “新洞人”的发现与研究

据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证实，继“北京人”之后，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是“新洞人”。

关于“新洞人”遗址发现的过程，还应归功于几个青少年一次冒险之举的意外发现。1967年，一些青年来到位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地区游览。当他们来到北京人遗址发掘的“第四地点”稍北面一些的地方时，发现了几道石缝。胆大的孩子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任何危险，于是，冒失的少年们一个挨一个纷纷钻了进去。他们沿着一条3米宽的孔道向前走了大约10米，发现了一个深约20米宽约10米洞穴。后来，他们把这一发现报告了有关的文物部门。

考古工作者于1973年对这一地点进行发掘，发现它与“第四地点”是相通的。同时，经过对发掘出来动物化石年代的测定，证实“第四地点”不仅与“新洞人”遗址相连，而且完全属于同一时间、同一文化遗存的代表。

在“新洞人”遗址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颗人的左上第一前臼齿化石，这为这一地区有人类活动的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经科学研究证实，这颗牙齿化石比所发现的“北京人”牙齿化石进步。在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如岩松鼠、赤鹿等。在同一层位中还发现了较厚的灰烬，其中含有动物骨头、石器、一颗朴树籽以及烧过的石头，这证明在“新洞人”的日常饮食中，熟食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

通过对“新洞人”遗址文化遗存的鉴定，“新洞人”生活在距今四、五万年之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他们仍然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生活时代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